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利角逐

1928年6月11日,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偕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国民党二次北伐基本完成。之后,蒋介石令阎锡山、白崇禧同处平津,意在使二人相互制衡,便于其嫡系力量深入北方。因不满蒋介石削弱异己,阎、白及其所代表的晋、桂二系开始接近,形成与蒋抗衡的势力。

裁兵意图

1928年6月,国民党二次北伐倾覆北洋政府后,国民党内形成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四大集团军。是时,归属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共有84个军,约300个师,兵额至少有220余万。庞大的军队花费浩繁,故裁兵被视为“党国之急需”。

1928年7月6日,国民政府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是为裁兵善后之先声。阎锡山、冯玉祥位列主祭人蒋介石左右,李宗仁、白崇禧等依次排立。

蒋介石裁兵背后的深意,各集团军首领心知肚明。有别于三个集团军,白崇禧的表态直接反映了军事将领的真实想法。是时,第四集团军在北方有六军一师,其中,第十三军驻北平南苑。针对舆论撤销河北过多驻军的呼吁,白崇禧直言,河北“所驻军队并不为多,设使中央对军费筹有办法,即再加倍,亦无碍于地方”,公开与蒋介石唱反调。

蒋介石在北平22天,将平津卫戍总司令一职委以阎锡山后,为避免第三集团军权力过大,又将肃清津东直、鲁残军的任务交由第四集团军前敌总

指挥白崇禧。是时阎锡山在北平铁狮子胡同设立卫戍总司令部,白崇禧则在与之不远的香厂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阎、白代表的晋、桂势力汇聚北平,颇有一山二虎之势。

1928年5月下旬,白崇禧与阎锡山在石家庄首次会面。白初见阎即有失望之情,二人行事风格迥然相异,势力范围交叉重叠,为合作平添了阻碍。但蒋介石的制衡政策,意外拉近了二人的距离。

联合应对

阎锡山接掌平津不久,与蒋介石即由合作转为相互猜疑。蒋介石将阎收编的残军转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调遣后,并不拨付给养,而是用“催逼”手段,从已划拨阎部的盐税中“借拨”50万元。阎对蒋不体恤卫戍之苦感到心寒。

8月12日,阎锡山得知,蒋介石欲将各方实权分子调至南京,尤望阎将治晋十余年的经验用到国民政府。这意味着阎会失去卫戍平津之权,且在山西的权力将被剥夺。获悉消息当日,阎锡山即以“病体缠绵”为由,拒绝了蒋令其赴南京的要求。

不久后,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同时约束政治分会主席不得对外发布命令及任免所属地域内人员。这意味着各集团军首领的权力将大为削弱。这次会议中,李宗仁离宁赴沪,李济深负气离会,李石曾、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中途退避。阎锡山暗自不满,认为“五中全会虽无价值,议决之案却可捣乱”。阎锡山与白崇禧二人一静一动,前者潜居幕后、不动声色,后者走在

台前、公开同蒋介石叫板。

会议结束仅一天,在太原乡间养病的阎锡山便遥控平津卫戍总司令部解散北平工会。白崇禧对其“断然处置,防患未来”的举措极为赞赏,建议先下手为强,对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党部“另保忠实党员,请中央委任”。白崇禧的建议甚合阎锡山心意,他电令山西和天津秘密“遴选忠实可靠党员”。这种地方军人试图以军制党、以军治政,借控制党部人选排除异己、强化统治的做法,与两广军阀如出一辙。

近而不亲

1928年8月中旬,李宗仁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奉命将部队全数开赴九江“剿共”之际,令白崇禧调北方驻军准备回汉。白崇禧借口在平驻军经济困难,先令第四集团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各一部回防武汉,引起外界猜测。

时局人心的动摇不定,让蒋介石暂时搁置了调阎锡山入南京的想法,一再劝其速返北平。阎锡山终于在8月30日表态,“现正赶速摒挡一切,俾便早日启行”。阎锡山很清楚,北方的财政困境只有依靠国民政府拨款解决。局势未明之前,他不与盟友过早捆绑,同白崇禧、李济深等军事领袖近而不亲,为与蒋介石的关系预留空间。

数次过招后,蒋介石开始考虑扩大阎锡山的权限,对外表示会为阎主持北平全权“另想办法”,“经济方面,当不成问题”。形势有利后,阎锡山顺势提出将卫戍军费由130万元提高到290万元,同时将辖区内重要职位抓在晋系手中。

1928年9月25日,阎锡山在各方关注下返回北平。未料刚到北平,即收到蒋介石令其兼任内政部部长的电函。直、鲁残军肃清后,北方政局相对稳定,又令蒋萌生调虎离山的想法,阎锡山则拖延不就。蒋介石继续加以财政制约,阎锡山担忧“长此挈延,真有哗变之虞”,以致10月中旬令赴南京的晋系成员将其辞职信递交蒋介石。但仅过一

日,又改变心意,告以“可缓送”。

让他对辞职动摇犹豫的,是来自白崇禧的压力。

阎、白较量

1928年10月25日,白崇禧由津抵平。蒋介石见阎锡山不愿调往南京,恐晋系在平津一家独大,仍令白部驻留北方。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认为裁兵编遣时机已到,遂定于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在蒋介石催促下,阎锡山于1928年12月12日抵达南京。未料阎前脚离开,平津局势即发生变化。12月16日,阎锡山得到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的情报,内称白崇禧与河北各军编遣委员会主任吴忠信、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勾结,强迫北平行营主任杨杰下令罢免蒋介石委任的北平公安局局长赵以宽,白崇禧表示“两星期内,要做一点工作”。

阎锡山对平津的异动格外重视,故特令在平晋系成员多加侦察。尽管阎认为,割地筹饷之事白崇禧等“绝不敢做”,但还是做好万全准备,电示部下:如白崇禧等武力染指平津,当以强硬手段应付;如以为可虑,可在天津、唐山、滦县附近布防。白崇禧在与阎锡山的较量中,明显处于下风。在蒋介石急调陈调元、吴忠信等回南京的“分化办法”后,白崇禧更加力不从心。

白崇禧遂向国民政府上呈西北国防条陈意见,表示愿率兵屯驻新疆。未料1月中旬白崇禧因胞弟病逝伤感过度,入院治疗。心力交瘁的白崇禧以回桂养病为由,欲辞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一职。辞职未获南京准许,但允暂时休养,驻北方部队由李品仙暂代指挥。

随着蒋桂关系的剑拔弩张,3月11日,白崇禧因忧虑略增旧疾,再入院养病,为蒋介石的政治运作提供了机会。李品仙的第八军和廖磊的第三十六军纷纷反白,白崇禧成为孤家寡人。之后,白崇禧变装搭船辗转香港、广州等地,狼狽脱险,回到广西。

据《历史研究》郝昭荔/文

“熊老板”为党经营“红色生意”

1929年,经党组织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熊瑾玎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租赁了一栋二层楼房,开设了天生祥酒店,用于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当时,熊瑾玎被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熊老板”。

天生祥酒店的主要职责是担当铺保(以商店名义出具的保证书)。当时汇款或在银行设立户头都需要铺保。国民党肆意抓捕进步人士,有时因缺乏证据,不得不释放时,也必须有铺保。1932年,地下党员朱仲丽被捕后,就是由天生祥酒店盖章铺保保释出来的。

天生祥酒店同时也是党的地下联络点。1930年,湘沪交通员唐锦涟在湖北为党中央筹得现洋2000余元,钞票1000多元及黄金首饰一批。在回沪途经沙市时,不幸被逮捕。关押期间,唐锦涟设法托人寄信到天生祥酒店转交给熊瑾玎,请熊瑾玎设法营救。熊瑾玎在接信后通过关系,以上海杂粮业公会的名义发电报给沙市军督稽查处,证明唐锦涟为杂粮商人,前往沙市采购杂粮,请予释放。同时,熊瑾玎平时也常常安排一

些从外地到上海的同志或者是党外的进步人士到天生祥酒店留宿。比如,党外进步人士廖奕到上海时,常常在天生祥酒店留宿。

当时廖奕与蔡元培、熊希龄等人关系紧密,有时候熊瑾玎也会通过廖奕去找蔡元培等人营救被捕的同志。

1928年底或1929年初,熊瑾玎让长子熊侃文在法租界亚尔培路开设了一家规模不大的酒店,名为正泰酒店。1929年春夏之际,熊瑾玎又在虹口区美租界内设立湘发泰酒店。这两家酒店也都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点。苏区来人时,留信在酒店,信封上就写有:熊泰儒、熊瑾廷等名字作为暗号,因此,熊瑾玎每天或者每隔一天就要到这些联络点看看。

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熊瑾玎既需要掩护好党的中央机关,又要经营好这些生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他的精心经营之下,这些“红色生意”都获得了盈利,而他将全部盈利都用于党的事业和救助生活有困难的党员,自己和妻子朱端贤则过着俭朴的生活。

据《档案春秋》王金燕/文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节俭传下去 中国更幸福

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